

中国近代 思潮与文化选讲

董丛林 编写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世界潮流浩浩

蕩蕩順之則昌

逆之則亡

歷史文選



■ 前 言

本教材是在前用同名课程讲稿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现分为上、中、下三编，另置附编。

上、中编是社会思潮方面的内容。所谓“思潮”，与“思想”有联系又有区别。思想可以是群体性的也可以是个人性的，可以相对集中也可以呈零散的形态；而思潮则强调“思想潮流”，它一定要具有起码的规模 and 影响力，是群体性的合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思潮就不可以有典型的代表人物，恰恰总是一个时期一个方面的某些著名思想家，成为有关思潮的代表。思潮同思想一样，同样有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之分，就中国近代的思潮而言，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呈现特别纷纭复杂的态势。本教材不求面面俱到，而是选择相对进步的思潮为主线来讲。

上编的诸种思潮，基本是与按时序递进的进步社会运动紧密联系的内容，涉及经世致用思潮、开眼看世界思潮、太平天国革命思潮、洋务思潮、维新和立宪思潮、民主革命思潮、新文化思潮，也就是前七章所讲授的内容。这基本可以从“纵向”上体现晚清和民初时期社会思潮发展演变的大致轨迹。除了这类思潮之外，还有可谓“横向”方面的种种思潮，这类思潮尽管也必有其历时性的演变，但不像上编所涉思潮那样与特定时段性的社会运动关联那样紧密，而是属某一专项方面。本教材中编具体选择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这三种思潮。

当然，所谓“进步”思潮只是与当时落后思潮比较相对而言，并不具有绝对性。一则，它本身在当时也存在局限和缺陷；再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在一定时间里先进的思潮有可能蜕

变为落后者，新陈代谢的特点十分明显。这种情况，在上编所涉思潮体现得尤为突出。正因为如此，在讲相关进步思潮的时候，尽量注意与它的相对落后面作对比，特别是对有典型论争情形者更是这样，以便在对比中凸现进步思潮的特色，同时也是为了兼对落后思潮作可能的介绍，使内容较为全面一些。

下编对有关“文化”内容作概括介绍。所谓“文化”，是一个弹性幅度极大而又众说纷纭的概念。上编所讲的思潮方面的内容，当然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化来看，即“思潮文化”。下编则移开这一特定角度，选择教育、学术、宗教几大方面的内容予以概略介绍（如《学术》一章中只选儒学和史学，《宗教》一章中只选佛教、道教和基督教），即本教材的后三章。这类内容，是一般中国近代史教材中较少集中讲到的，我们需要有所了解。了解这些内容，有助于对上、中编思潮内容的进一步深入理解，可收相得益彰之效。

上、中、下编是本教材的主体部分。所依原讲稿，即参考、利用了多种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教材、专著和论文中的相关内容，酌情或径予采录，或据以摘编。此次修订编写，仍予基本保留，较集中者均随文注明出处，在此向原书、文作者一并鸣谢！在可能条件下，同学们若根据注释觅及原书、文作扩展性阅读，对学习自然会更有帮助。除此之外，不再专列参考书目。再就是，注释不求过繁，一则适当把握出注数量；再则注项酌情精简，如版本之项，今版同一种书只在首次出现时出注，不会导致版本淆乱的古籍则该项全略。

附编是有关参考资料选编。之所以选编这样一部分内容，是基于下述考虑：学习思潮和文化方面的内容，有必要配合阅读一些典型文献资料，但对于同学们来说，有关书籍或许不太好找，即使找到在篇目选择上也往往碰到困难，这里我们适量地选编一些，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再者，选编这样一部分内容，前边的

讲义中可以适当简化对原始材料的征引，大家可通过阅读后边的相关资料专篇，来获取相应的补充印证，这样，更有助于对有关史料的完整性认识，避免断章取义而产生的片面性。还有，可以通过研读资料专篇，来进行对文献资料的内涵理解、信息挖掘、选择运用等这样一项重要基本功训练，而这项基本功是我们学习、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所不可缺少的。所以，决不要把下编内容视为可有可无，需配合讲授内容阅读。在文献资料的选择上，力求针对性强，短小精悍（对过长的文献采用节选方式），并尽量选取较为易读的，避开文字上过于艰涩者。即便如此，大家在自行阅读所编选的这些参考资料当中，仍可能会碰到字词、典故等方面的一些困难，不必在非关键性的问题上太过胶着穿凿，应着重求取把握基本意旨。

本教材的出版，得到学校教务处和历史文化学院的关心和支持，在此表示深切感谢！也希望老师和同学们对书中的错误和不妥随时指正。

编者

2011 年 12 月

目 录

上 编

第一章 经世致用思潮	(3)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潮兴起的背景	(3)
第二节 经世致用思潮的主要内容和代表人物	(8)
第二章 开眼看世界思潮	(15)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闭塞状况和变局刺激	(15)
第二节 开眼看世界的典型人物及代表作	(18)
第三节 开眼看世界思潮的意义和影响	(24)
第三章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潮	(27)
第一节 洪秀全从“拜上帝”到反清思想的确立	(27)
第二节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潮的勃兴	(31)
第三节 太平天国自身影响其革命思潮的负面因素	(37)
第四章 洋务思潮	(41)
第一节 洋务运动的历史背景和大致历程	(41)
第二节 洋务思潮的内容要端	(44)
第三节 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	(53)
第五章 维新和立宪思潮	(58)
第一节 早期维新思想	(58)
第二节 维新思潮的勃兴	(61)
第三节 立宪思潮	(70)
第六章 民主革命思潮	(77)
第一节 革命知识分子群体及其革命宣传	(77)
第二节 民主革命思潮的核心内容——三民主义	(86)

第三节 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论争	(92)
第七章 新文化思潮	(102)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及其思潮的主要内容	(102)
第二节 早期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旧之争	(108)

中 编

第八章 教育救国思潮	(117)
第一节 教育救国思潮的兴起和发展背景	(117)
第二节 典型人物的相关言论和思潮汇成	(122)
第三节 教育救国思潮评析	(133)
第九章 实业救国思潮	(137)
第一节 实业救国思潮的历程及生发原因	(137)
第二节 实业救国思潮要旨及其典型人物思想示例	(141)
第三节 实业救国思潮特点和意义	(149)
第十章 科学救国思潮	(151)
第一节 中国近代科技及业人状况	(151)
第二节 科学救国思潮的萌生和发展	(156)
第三节 科学救国思潮评议	(162)

下 编

第十一章 教育	(169)
第一节 旧式教育的危机与初步变革	(169)
第二节 维新教育	(175)
第三节 新学制的建立和科举制的废除	(180)
第四节 清末学校状况及民初教育	(186)
第十二章 学术	(191)
第一节 儒学	(191)
第二节 史学	(199)

第十三章 宗教	(207)
第一节 佛教与道教	(207)
第二节 基督教与教案	(214)

附 编

1.《海国图志》原叙	(225)
2.议战(节选)	(226)
3.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	(229)
4.天朝田亩制度	(231)
5.资政新篇(节选)	(236)
6.讨粤匪檄	(240)
7.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节选)	(242)
8.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	(245)
9.筹议海防折(节选)	(248)
10.商战(节选)	(250)
11.议院	(251)
12.《孔子改制考》叙	(255)
13.致总署	(257)
14.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258)
15.《仁学》自叙	(261)
16.学校总论(节选)	(263)
17.请广教育而成人才折(节选)	(264)
18.《劝学篇》序	(265)
19.非攻教	(268)
20.儒学统一时代(节选)	(269)
21.中国之旧史学(节选)	(270)
22.《革命军》绪论	(273)
23.普告同胞檄稿	(276)

4 中国近代思潮与文化选讲

24. 同盟会宣言	(277)
25. 民报发刊词	(279)
26. 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	(281)
27. 奏请宣布立宪密折	(284)
28.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节选)	(287)
29. 拟设国粹学堂启	(289)
30. 实业救国之玄谈(节选)	(290)
31. 振兴实业最好实行开放主义	(292)
32. 汉冶萍就职演说	(293)
33. 敬告青年(节选)	(294)
34. 孔子与宪法	(295)
35. 文学革命论	(296)
36. 科学(节选)	(300)
37. 狂人日记(节选)	(301)
38. 劳动教育问题(节选)	(302)
39. 何为科学家(节选)	(304)

上 编

■第一章 经世致用思潮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潮兴起的背景

先需要说明“经世致用”一词的涵义及使用情况。就涵义来说，它是指在治国安邦、匡时济世方面能够发挥实际作用，可以说已成为习用的词语。“经世”，按照《辞源》中的释义为“治理世事”，《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治理国事”，大旨无异。“致用”，上述两种权威工具书的解释都是“尽其所用”，并且例句都是引证《易·系辞上》中“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句。另外，“致用”还有“付诸实用”的义项（如成语“学以致用”）。而“经世”、“致用”联结起来，无论是在治理国事、世事方面能够“尽其所用”，或是“付诸实用”，自然构词本身都是讲得通的。《辞海》中则直接收录有“经世致用”一词，释义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须有益于国事的学术思潮。”这显然是更有特指性的具体解释，并且是就人们熟知的顾炎武、王夫之等代表性人物的“源头性”相关思想而言的。而这种思想，在彼辈人物之后虽一度衰落但并没有泯灭，进入晚清之际及其后，在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下又有新的发展，直接使用“经世致用”一词的也不乏其人。不但大师级人物梁启超多年间曾屡屡用之^①，而且更早于他的使用者也有其例。如1896年（光绪

^①如他从1901年发表的《南海康先生传》到19世纪20年代撰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中，即有多处用及该语。

二十二年)间,由陕西学政赵维熙主稿、与该省布政使张汝梅会同陕甘总督陶模所上,关于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的奏折中,即有谓:“圣门论学,不尚空疏,游艺继于依仁,政事先于文学。后世士大夫或专精训诂,或仅事词章,或空谈性理,而于经世致用各学,转致少所钻研。”^①将其所谓“经世致用”各学,与此语前边所指种种偏弊对应起来理解,其意自可更明。至于在现在学界,“经世致用”一词使用频度之高、范围之广,更是有目共睹,成了一个约定俗成并且指义明确的习用、常见词语^②。

从学术传统的角度看,经世致用思想古已有之,“从先秦诸子开始,中国士人便以关怀社会、参与政治、服务人生为自己学业价值的最高体现”^③。但经世致用也有鲜明的时代性。与鸦片战争前后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有着直接渊源关系的,是明清之际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所倡导的实学思潮。他们主张治学和行事,都要按照经世致用的原则来做,摒弃那种空疏无实的弊习。这派人物也的确能够身体力行,开一代新风。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思想风习并没有能够逐步发扬光大起来,在清前期的相当长时间里受到了压抑和阉割。到了鸦片战争前后,这种思想才又蔚成风气,并较以前包含进了新的时代内容。

经世致用思潮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得以兴起,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分不开。

一是社会政治方面。这时清王朝已经明显地走上了衰败之路:朝纲废弛,政治腐败,官场贪污盛行,贿赂成风,巧取豪

^①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27页。

^②本段据董丛林《胡林翼政迹与人生》,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199页。

^③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29~930页。

夺，祸害民众。有人对此作有这样生动的揭露：“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括邑之钱米，易金贿大府，以博其一喜。至于大饥人几相食之后，犹借口征粮，借名采买。驱迫妇女逃窜山谷，数日夜不敢归里门，归而鸡豚牛犬一空矣。归未数日，胥差又至矣，门丁又至矣，必罄其家产而后已。”^①社会经济也趋于凋敝，国家财政困难，民众生活困苦，灾害频仍，流民充斥，饿殍遍野。军队也腐败不堪，武备废弛。清朝拥有20多万人的八旗兵和60多万人的绿营兵，总共接近90万人，数量不为不巨，耗饷不为不多，但形同虚设，平时军官不理营务，只知克粮冒饷，花天酒地；士兵不勤操练，整日游闲，甚至吸食鸦片，聚开赌场。一旦有事，这样的军队何能应付？统治者骄奢淫逸，广大民众生活每况愈下，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嘉庆朝的白莲教大起义，绵延近十年之久，参加者达数十万人，地域上波及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五省。天理会起义也波及数省，甚至有林清率领的一支仅200人的队伍，就一举攻入紫禁城之事，以至嘉庆皇帝惊呼这是“汉、唐、宋、元、明以来未有之祸”^②。外患也日益侵逼而来。外国奸商、海盗不断骚扰，特别是鸦片输入不断增多，渐成泛滥之势，鸦片战争的爆发，便是以此为直接导火索的。对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从以往通史课的学习中当已有较多了解，这里不再作详论。总之，是在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面前，有识之士的忧患意识不断强化，他们关注社会现实，关注国计民生，勇于揭露时弊，呼吁进行改革，以求克服危机，救国救民，于是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并使之成为一股思想潮流。

二是学术文化方面。由此可以窥及经世致用思潮更为内在和

①张际亮：《答黄树斋鸿胪书》，《张亨甫文集》，卷三。

②魏源：《圣武记》卷十。

直接的生发路径。我们对这方面的有关知识或许了解不够，这里拟作稍详细的阐述。

明清之际的经世派，讲求通经致用，求实摒虚。譬如顾炎武即颇典型，他主张为学要“明道救世”，著书立说应有裨于世用，反对空疏虚玄、游谈无根。他的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就很典型地贯穿经世致用的思想。由这种指导思想所决定的治学方法，则是注意考证，凡事推究本原，明了来龙去脉，把握真相。梁启超把顾炎武视为所谓清学的“黎明运动”的第一从事人，并将其学术研究的方法归纳为“贵创”、“博征”、“致用”三个方面^①，清代考据学成为学术重镇，便与顾炎武辈的倡导作用分不开。

不过，清代的考据学并没有按照经世致用的路径健康发展下去，而逐渐走向了厚古薄今，脱离现实，沉溺故纸堆中钻牛角尖，做文字游戏的歧途。到了乾隆、嘉庆时代，带有这种流弊的考据学达到鼎盛。其间，虽也有戴震（字东原）、章学诚（字实斋）等少数经世意识较强的学者，但他们在当时并不被推重。当然，乾嘉考据学在考订整理古籍和史料研究方面也有着无可替代的贡献，对此不应抹杀，但总的看来，是在清朝统治者文化高压政策下的一种文化畸变，所谓“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②，诚不失为这种“畸变”的一个重要原因。“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当时许多士人都把远离现实的考据学作为明哲保身、安身立命的一种手段。因为汉代特别是东汉儒生治经，多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清代考据学者标榜以之为依归，故其时的考据学习称“汉学”，与作为理学的“宋学”相对称。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12页。

② 同上书，第28页。

中就以“家家许（慎）郑（玄），人人贾（逵）马（融），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来描述乾嘉考据学“兴盛”的局面。这种情况，因为不会发生妨害清朝统治的政治异端，故为清朝统治者所认可，把“汉学”与“宋学”并列为其“官学”。但这种学术文化局面，与关注日益严重的社会和民族危机、寻求解决路径的现实需要自然不相吻合，有识之士便大力张扬经世致用的思想旗帜，以矫“汉学”的流弊，复兴“今文经学”成为他们所使用的重要手段。

所谓“今文经学”是相对“古文经学”而言，它们是儒家经籍的不同统绪，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两大学派。今文经，指汉代学者所传述的儒家经典，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大都没有先秦的古文旧本，而由战国以来学者师徒、父子传授，到汉代才一一写成定本。汉武帝时表彰儒家经典，建立经学博士，所用的都是今文经籍。古文经，指秦以前用古文书写而由汉代学者训释的儒家经典，相传原本出于孔子住宅壁中和民间。起初古文经只在民间流传，到西汉末年才开始形成与今文经一争高低的势头，并逐渐也成为“官学”，东汉时已颇显兴盛。古今文经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文字和来源的不同，也不仅仅在于篇章上的差异，而是牵涉到对经书内容的理解和解读方法。古文经学派一般认定六经都是前代的史料，重视对所发现经书的校勘考订，治经注重名物训诂。乾嘉考据学派基本上便是沿袭自这条路径。今文经学派则认为经孔子“制作”的经籍包容进了其“托古改制”之义，他们治经注重挖掘和发挥“微言大义”。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派人物，多利用今文经学与“汉学”对抗，为他们的经世致用思想张本。

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之源，可以追溯到乾隆时代的庄存

与^①，他的两个外孙兼弟子刘逢禄和宋翔凤^②，继承了庄氏的衣钵，进一步巩固了今文经学的阵地。不过，他们基本上还是想走西汉今文经学的老路，尚无鲜明的经世致用、改革弊政的思想要求。到了龚自珍、魏源等人，才借今文经学高扬起经世致用的旗帜。

当然，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派人物，未必都是典型的今文经学家。不过，其时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又确实与今文经学的复兴有着密切联系，我们需要对此有个大概了解。

第二节 经世致用思潮的主要内容和代表人物

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潮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呢？依据相关著述的论列，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指斥时弊，呼吁变法。从嘉庆中叶到道光年间，许多士人对朝政的各方面弊端给予更加严厉的抨击。经济方面，他们谴责清王朝“开捐例，加赋，加盐价”，好比是“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地方官吏“其贪以浚民之脂膏，酷以干天之愤怒”，权贵兼并土地，造成“无地者半天下”。政治方面，他们指斥士大夫“廉耻道丧”，官僚阶级骄奢淫逸，专制君主以“势、利、名私一身”，引起觊觎争夺之乱，这样的政治机器“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文化教育方面，他们抨击科举制度使“士子以腐烂时文互相弋取科名以去，此人才所以日下”。经世派在批评时政的同时，还力图寻找“振起而补救”的办法，提出种种“补偏救弊”的方案。龚自珍从《周

①庄存与（1719～1788），江苏武进人，官至礼部侍郎。

②刘逢禄（1776～1829），江苏武进人，官至礼部主事。宋翔凤（1799～1860），江苏长洲人。

易》等经典中吸取变易观念，提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魏源也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呼吁采取切实措施除弊祛患。

第二，筹议改革各项“大政”。如包世臣提出综合治理漕运、盐法、河工“三大政”的建议，旨在杜绝主事官吏中饱私囊，而务求“上利国下利民，则中必不利于蚕蠹渔牟者”。他和陶澍、魏源、林则徐等人于此都有若干筹议。如漕运方面，主张以海运取代河运，认为这样一可节省费用，二可杜绝贪污；盐法方面，认定以变官营为商营是为上策，并通过裁革陋规改善盐政；河工方面，强调“厘工剔弊”，要由消极“防河”到积极“治河”，提出御坝、浚淤并举等具体措施。经世派注意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又重视实地考察，他们提出的建策不乏科学切实成分。

经世派人物中有的带有明显的传统重农主义倾向，像龚自珍主张实行“农宗”之法，按宗法关系分配土地，解决耕者无其田问题。他反对限田法，提倡根据才力、德行分配土地和财富，“贵智贵力”者应多占土地以增殖财富，他还建议调集内地无田之民到西域垦荒，开发边疆，就地解决兵粮问题，且消解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第三，史地著述方面的经世动向。一是表现在探究边疆史地以筹边防。道光年间，沙俄、英国已先后染指中国东北、外蒙、西北、西南，西北边疆又屡次发生分裂性叛乱，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受到严重威胁，这引起经世派的密切关注。龚自珍首倡“天地东西南北之学”，著文揭露沙俄侵略阴谋，力倡西域设行省，并著《蒙古图志》，研究北方边塞、部落、山川形势、源流合分。由此发端，边疆史地研究进入一个繁荣时期。张穆（1805～1849）、何秋涛（1824～1862）的《蒙古游牧记》、《朔方备乘》，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沈垎（1795～1840）的《新疆私议》，姚